

综述·评介

● 陈翔华

中国书籍及有关印刷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钱存训教授《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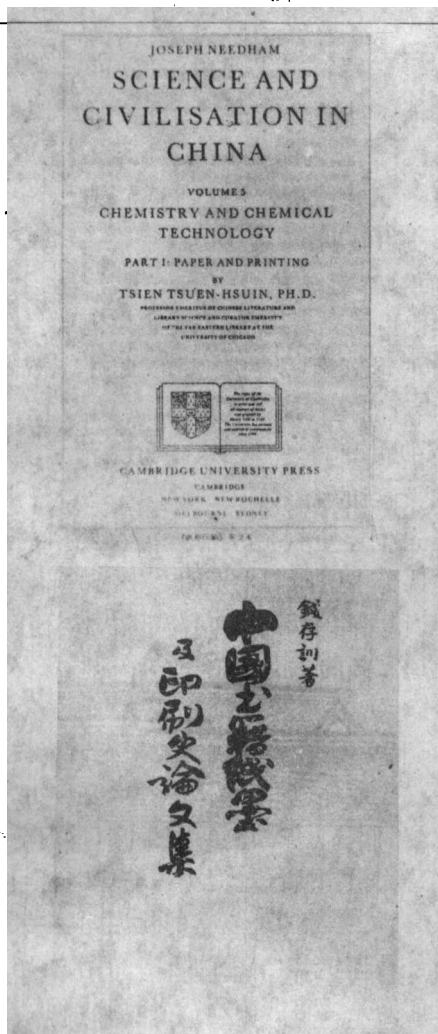
纸与印刷术的发明,引起了书籍制作的重大变革,并由此促使这一人类思想文化的载体得以大量地生产,促使人们所创造的知识得以迅速地传播,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中国是造纸与印刷术发明的故乡。中国早在公元前后就已产生纸,七、八世纪已使用雕版印刷,创始于11世纪的活字印刷还在西方“印刷之祖”谷腾堡之前400余年,而印刷所用煤烟制成永不褪色的墨则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人们公认,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而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纸与印刷术就是四大发明中的两种。因此,纸、墨与印刷史诸有关问题,素来成为文化史、科技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现在,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籍华人学者钱存训教授所著《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论文集著者钱存训博士,长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中国书史、印刷史的教学与研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之为“关于这一课题的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1]。钱先生的《书于竹帛》,是一部对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中国图书和铭文发展最早作出详尽而全面研究的专著。此书英文本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以来,曾先后译成中文(香港1975年中文增订本的书名为《中国古代书史》,北京1988年中文增订本的书名改作《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和日文(东京1980年本的

书名为《中国古代书籍史》),在国际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钱先生(见图1)1968年接受李



约瑟博士之邀请,历时15年而撰成杰作《纸和印刷》一书(见图2),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册,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亦已译成中文本出版。这是李约瑟系列丛书中第1本由个人独立完成的著作,以其论述之精当、内容之详尽、资料之新颖而饮誉于世界。现在出版的《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2]一书(见图3),选入30年来所发表的专题论文16篇,其内容分为4章:典籍章分别考订古代文献、简牍、封泥及书刀的形制与特点;纸墨章追溯其原料、制作及应用之起源与发展;印刷章研究其各种技术的沿革、程序等问题;影响章则讨论纸与印



刷在中国发明的原因、背景及其在学术和社会上的作用。附录 11 篇,其中《中国印刷史简目》收录近人著述约 500 种,分 15 类,按年序列,可以由此窥见中外学者研究的进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部书中所论的问题专门而深入,见解精辟,分析细密,资料翔实,与《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纸和印刷》二书相辅而行,具有相得益彰之功。这本论文集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著作。

第一,善于通过中西对比,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发明。

纸与印刷术的使用,以中国为最早。在欧洲,纸在 9 世纪时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12 世纪时开始造纸,距中国使用纸至少迟 1000 年;14 世纪出现雕版印刷,比中国迟 700 年;15 世纪中叶出现活字印刷,比中国迟 400 年。为什么

这些发明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欧洲呢?钱存训先生在这部书的《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早于欧洲的原因》一文中,通过对比,分析中西各自的历史条件及特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例如,主要是将反刻文字转移到接收它的载体上并多次复制副本,以满足大规模需要的印刷术的产生,是由于制作和使用各种印章以及拓印碑文方法的自然发展。钱先生认为,印章与石刻在中国和西方都已很早使用,而且制作材料也都一样,但是其间存在着若干主要的差别,然而由此导致在中国和西方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从印章方面来说,西方印章主要是雕刻图案(只有少数刻有文字),成圆形或椭圆形,主要有圆柱石印与打戳印章两种类型。圆柱石印在粘土、胶泥或蜡的平面上滚动,压印出各种神像、英雄、动物、星辰、工具以及图徽。打戳印章有多种多样的形状,流行于埃及的印章背面刻着蜥蜴(即圣甲虫,故又称此为“圣甲虫印章”),是一种表示复活、永生的神符,虽是平底而有少数铭文,但是其宗教性质居于支配地位,大大盖过作为复印工具的功能。这些印章的图案一直是浮雕,甚至今天仍旧打印在蜡一类的硬性材料上,很少印在如纸、羊皮一类柔性材料上。钱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的习惯和用法,阻碍了在西方从使用印章中产生出印刷的想法。”^[2]但是,中国的情形则不相同。中国印章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平底而雕刻反体文字,后来又常在纸上盖印,这和雕版印刷的性质非常接近。尽管大多数印章面积小、刻字不多,但也有近于印版的。如晋葛洪《抱朴子》云:入山者所佩有“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3]。唐徐坚《初学记》亦载:“道士当刻枣心作印,方四寸也。”这种道士木质印章面积相当大,几乎与印版相似。印章技术的日趋完善,为印刷术的发明准备了直接条件。再从石刻与碑拓方面来说,中国与西方也大不相同。西方石刻主要是将石料用作艺术材料,利用石版来作纪念碑或雕刻墓碑,而较少刻字。但在中国,很早就广泛采用石碑,以作为刻写纪念文字或为保存经典并使其标准化的最常见材料。早在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 年),

蔡邕奏请朝廷,始将儒家七经刻于石碑,历8年,成20余万字。许多世纪以来,在石版上刻出了千千万万文字的儒家和佛教、道教经典。这些镌有繁多文字的石刻,其情形与雕字木版有仿佛之处。另外,就类似于雕版印刷过程的墨拓石碑铭文技术而言,西方似乎直到19世纪才开始采用,而中国则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总之,由浮雕反文印章和在薄纸上拓印这两种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雕版印刷方法,中国早于欧洲使用乃是不同文化发展而造成的结果。”

钱先生从中国与欧洲的不同文化背景出发,还研究了中国印刷术的西传、印刷术在中国本土以及在欧洲所发生的不同社会作用等问题。这些研究也多发人所未发,提出新的见解或作出新的阐释,为学术界所重视。

第二,既对中国本土的考古发现十分关切,又致力于海外文物资料的探求,从而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

钱先生充分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参证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及其有关问题作出深入的探讨。例如关于竹简、木牍、缣帛、纸张等书籍材料演化情况的研究,他十分关注出土文物及其时代性。敦煌与居延出土的大批木牍,约属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2世纪,纸质材料奇少;楼兰地区之古籍,约属于公元3~4世纪,木牍仅占20%;吐鲁蕃地区的古籍,约属于公元后5世纪,几乎全为纸质。这说明了所发掘区域的文物时代越晚,而发现的旧式书写材料也就越少。再从文献记载来看,标志简牍的单位是“篇”,帛纸的单位是“卷”,历代史书目录记载“篇”、“卷”变化的情况也反映了书写材料的变迁趋势。在《汉书·艺文志》中,有3/4著录为“篇”,仅1/4为“卷”。到东汉,著录之“篇”“卷”,各占一半。至三国时代,卷轴之数已超过简牍。及至晋代,纸已普遍使用,简牍之书已不经见。由此,钱先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十分明确地指出:“如今尚不能断定竹木之用于书写的确实年代;大致说来,竹木是较缣帛为先。简牍、缣帛与纸的使用,在时间上并无显著的分野;我们不能误认使用缣帛或纸张之始,简牍即已被淘汰。

中国各种书写材料之使用,大致可分为三期:(一)竹简、木牍:自上古至公元后三至四世纪。(二)缣帛:自公元前五或六世纪至公元后五或六世纪。(三)纸:从公元前后直至现代。……竹帛参杂使用时期,约达一千余年,帛纸共存约五百年,而竹木与纸并行约三百年。”^[1]至于竹简与木牍使用的先后,又根据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与简牍的形式,认为:“竹简的使用,应先于木牍;木牍可能是竹简的代用品,为汉代在公元前后通行的书写材料。”^[2]这些意见都是实事求是,犁然有当的。

钱先生还重视流落海外的文物资料的研究。被认为中国印刷术发明之先河的印章使用技术,其印文除了用于缣帛与纸以外,还用于封存公文或私函的封泥上。当时,将简牍所写的文件置于囊中,在囊外系绳以胶泥加封,上盖铃印,防止泄密或失窃。这种封泥还是研究简牍制度以及汉代地理、官制的又一种重要实物。钱先生游巴黎时,曾见旧友藏封泥十方,遂商请移存于芝加哥大学,并撰《封泥小识》一文,将印文一一加以考释。这批国外仅有的封泥,其中二枚为稀品。一枚印文作“郃阳丞印·都水丞印”,此一泥二印乃是两官署会衔行文时所同印。按郃阳县为汉时左冯翊所辖京师24县之一,在今陕西省合阳县;都水丞为掌管水利之官。此异品联封,未见著录,极其罕见。另一枚印文作“广祀令印”。按“广祀令”官名不见于《汉书》。这二枚稀品,俱可补记载之缺。此外,这部论文集所援据的国外所藏文物资料还有: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藏东汉墓砖像抱简图,美国芝加哥大学藏唐写本《妙法莲华经》、清潘祖荫致李鸿藻函札,纽约公共图书馆藏北宋雕版片一块,美国苹果城亨特纸品博物馆藏清代墙纸,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唐拓本《温泉铭》,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所藏宋淳熙本《桔录》,日本奈良正仓院藏隋写本《贤劫经》,东京纸品博物馆藏纸老虎,及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所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等。对这些文物的介绍与研究,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实事求是的论证,不仅使论文集的内容更加充实而富有创获,并且也

为国内学者提供了重要信息与学术成果。

第三,十分重视社会应用与功能的研究。

造纸术、印刷术被发明后,对中国社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钱存训先生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纸张除了作为书写与印刷材料外,还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例如用在衣着方面,有纸冠、纸鞋、纸衣、纸袄、纸襪、纸帐、纸纬、纸衾、纸席、纸背手(保护肩与手)等;用于祭祀,有冥纸钱、男女纸俑、纸马、纸骆驼、纸车、纸屋、纸棺,以及各种纸神(如灶神、门神、土地神、财神与其他神祇)等;用于金融交易,有飞钱(又名便换,即为票据)、交子、钱引、会子(纸币)、交引等;作为家用的纸制品,有纸灯笼、纸扇、纸伞、纸旗、纸屏、纸囊(包装纸)、纸帔、纸巾、纸套杯、草纸(卫生纸)等;用于娱乐的,有剪纸、摺纸、纸风筝、纸牌、纸棋子、纸笛、纸箫、纸皮影、爆竹、烟火等;以及用于战争的纸甲,作为玩具的纸老虎等等。钱先生不遗余力地勾稽史料,一一考订其原委,指出:“纸最早大概用于包裹和衬垫器物,在东汉初始用作书写。……在西方对纸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就早已出现了这些供书写、装饰、贸易、礼仪、祭祀、家庭和娱乐等所用的各种纸代用品。”^[6]

印刷术发明之后,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书籍生产迅速增长,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也大大促使文化事业的发达与繁荣。例如宋代的教育事业十分发达,除京师太学、国子监、四门学等外,各地还开办官私学校 1099 所(包括州学 189 所、县学 464 所、私学 446 所)。数以万计的学生大量涌现,如无印刷业供应足够的教本与读物,众多学校是难以开办的,而学校的兴盛又反过来推动印刷业的发展。印刷术与普及教育、培养人材的这种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钱先生《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能》一文所引统计资料表明:宋代进士有姓名可考者共 29000 余人,而两浙(今江苏、浙江)、福建、成都(今四川)、江南西(今江西)、江南东(今安徽)各路即占 24000 余人,约为总数的 82%;宋代印书依记载所知有 1500 种,而上述五个地区

曾印书 1200 种,约占总数的 80%。反之,夔州路(今川东一带)仅有进士 103 人,而所印书也只有两种。由此可见,印刷之于造就人材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学术的影响,钱先生还深刻地指出:“印刷术普遍应用,一般认为是促进宋代经典研究的复兴及学术风尚改变的多种原因之一。宋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经学、理学、史学、文学、美术、考古和科技等各方面,都有特殊的成就。譬如,迄今通行的儒家经典《十三经》的形成,官修正史《十七史》的首次印行,地方史志的编纂,数学、工艺、医药和科技等类新作的问世,以及编印篇幅庞大的类书和丛书等等,都可说明印刷术和学术风气改变的关系。”^[7]这些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分篇为各具显著特色的专题论文,合卷则为内在联系严密的完整著作。有些论文的若干内容,尽管被写入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与《纸和印刷》,但由于不受后两书的体裁限制,以其资料更加丰富、分析更加细腻,而在学术上仍不失独自存在的重要价值。这是一部能给人以良多教益的著作。

参考文献

- 1 钱存训.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见李约瑟.纸和印刷序言.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序言
- 2 钱存训.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208
- 3 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四部备要本。
- 4,5 同 2:16
- 6 同 2:85
- 7 同 2:235

陈翔华 笔名岑桦,1961 年杭州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班毕业,离休前就职于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在 17 种刊物上发文 120 余篇,出版专著 1 种、古籍整理 9 种。通讯地址:北京文津街 7 号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邮编 100031

(来稿时间:1992-10-22,编发者:丘 峰)

G251.6

Chinese Books and the Major Results Concerning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 — Reading Notes of Prof. Qian Cunxun's " Collected Papers of Chinese Books, Paper and Ink and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Chen Xi-anhua. 34—37

Papermaking and the art of printing are the two of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China. The collection of papers concerning these two great inventions discussed by Prof. Qian Cunxun includes 16 peice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a period of 30 years and falls into 4 chapters: ancient bookd and records, paper and ink, printing and the impacts of them. One of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the collection is its full and accurate contents with penetrating analysis and the author, by way of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ooks closely at the two great inventions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3 illus.

Editions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 China

Hisotry of printing — Studies

G256.1

A Summarized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cumentation Research / Xie Zhuohua and Shi Bao-jun. 38—46

Having achieved a certain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documents, the regularity of documents and the professional documentation, the theoretical circles of Chinese documentation are gradually changing direction from a scattered and individual research to a stage of systematic discussions and approaches, but pribes into the fields of the history of documentation, systematic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of documentation and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documentation subject are still very weak and vulnerable. Documentation research in the 90s carries within itself the breakthrough in quality. 38 refs.

Documents — Studies

Documentation — China

G254.2

New Progress Mad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 Luo Xinghui. 47—49, 66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studies, pur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have been on the decrease, none the less, research problems of very strong practicalness, such as concrete problems of technology and problems concerning management methods, etc. have been on the rapid increase. This, which was shown quite clearly in the 1988—1991 LISA subject literature, should bring to the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ld to take seriously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2 tabs.

Bibliographic control — Reviews

LISA — 1988~1991

G254.3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Subject Retrieval Language (1949~1991): A Summary / Zhai Fengqi, Zhangzhilan. 50—56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were altogether 96 titles of subject thesaurus drawn up, translated and printed, 20 titles of monograph on retrieval language published and 1077 papers on subject retrieval language issued in China from 1949—1991.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shows that the integrated classified subject retrieval language will be the main stream of the future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Subject retrieval language research — Reviews